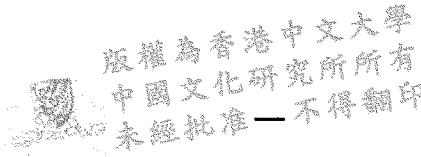





## 中國二十四方位觀念之傳承及應用

王爾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國人之傳統方位觀念與對方向之認識，當早創生於上古之世。中國人辨識四方方向均以太陽為標準。日出初現於林木之中指示為東。近晚鳥歸宿巢，時當日落，乃以此日落方向指示為西。甲骨文南字作形，顯示一個定正日中之指向。而北方則意指一人面對日中，其背後所對者即是正北方向。顯見古人利用太陽之恆常普照，作為辨識方向之標準。至其可靠之文獻紀錄，則有現存之甲骨文為據。

今人胡厚宣氏先後著有《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證》及《論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之起源》兩文。<sup>1</sup>饒宗頤氏更著有《四方風新義》，將中國之四方風與巴比倫「開闢史詩」所載四方風作一比較，並廣及甲骨文字所載殷人禘祀之四方祭禮。尤足證東南西北四方觀念之應用，確早見於殷商之世而無可懷疑。<sup>2</sup>不惟如此，胡厚宣氏據甲骨文字云：「中商即商也。中商而與東南西北並貞，則殷代已有中東南西北五方之觀念明矣。」<sup>3</sup>可信殷商時代定必行用五方觀念無疑。

近人確知殷商之世，已經文物充實繁富而文化大備。方向認識當不止於五個方向，甲骨文字實並同時出現東南西北四方方位連用之詞。胡厚宣氏就殷商重視農業，舉出武丁、文丁、武乙各王時代之四方受年貞辭不下十餘處之多。如胡氏所引《殷契粹編》九〇七所載：

己巳王卜，貞(今)歲商受(年)。王曰，吉。東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



- 1 兩文均載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專刊，臺北大通書局影印，1972年，頁369-381，383-388。
- 2 饒宗頤《四方風新義》，《中山大學學報》，1988年4期，頁67-72。
- 3 《論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之起源》，頁385。

胡氏又據《殷虛書契前編》、《後編》及《龜甲獸骨文字》三書，舉出王卜雨之記載：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南來雨。其自西來雨。其自北來雨。<sup>4</sup>

胡氏指出殷人稱舉四方方位之習慣，大多是順著太陽轉向次序，即東南西北，或偶用逆序東北西南，決不見東西南北排列次序之舉稱。惟《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所引《卜辭通纂》第三七五片甲骨文字云：「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sup>5</sup>顯見同一卜骨而釋文前後次序異於胡氏定說。惟東西南北方向之熟用於甲骨文字則是普遍之事實。

「四方」之稱謂，習見於古代文獻，凡《尚書》、《詩經》、《左傳》、《國語》均能見到，無待多論。《周禮》各卷，開宗明義，每卷必首書「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等總綱語句，自為功令要典、重大原則。所謂「辨方正位」者，鄭衆《注》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蓋為營城建都之第一步、造構宮室殿堂之起始，其設施應在百政之先。此當為宗周建國之要典、周公營造洛邑之記注，自必鄭重存於太史。

惟自《逸周書·周月》、《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雖均申述四季十二月天象物候，實就天空分野按十二個月各表一個方向。再就《呂氏春秋》、《禮記》、《淮南子·時則訓》以觀其二十四氣之輪轉變化，則於天上空際，已分別判定二十四方位。惟《淮南子》另有九野之說，自應為上古八方九野觀念之總結；而其表達仍就天空星域二十八宿畫分部位，並明顯標示一定方向。茲舉「九野」說之畫分：

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顛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sup>6</sup>

上古八方九野觀念，於此作一總結。

## 二

中國遠古至少早在殷商之世，已熟知東南西北四方之分野；而古人正確辨識方位，實

4 胡厚宣《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載《甲骨學商史論叢·續集》，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專刊，臺北大通書局影印，1973年，頁69、70。

5 《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上册，頁8。

6 陳廣忠《淮南子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頁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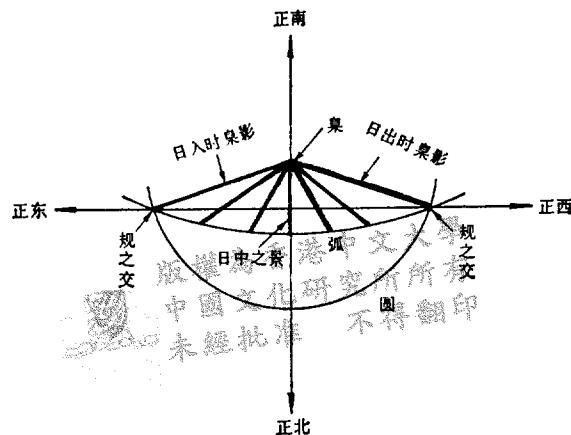
依據一定之科學方法。早在發現磁石指南之前，已經可以簡易而迅速測定東西與南北方向，其所用者即是圭臬測景之法。

《墨經上》云：「日中，正南也。」同書又云：「直，參也。」此兩條《墨經》文字，下無解說，簡略實甚。民國學者張其銓《注》云：「此當言立表測日正晷之理，惜說已佚。」<sup>7</sup>然可知其以日景定正南方向之意。又有范耕研解說其詞旨云：「此言測量立表窺影之術，故先舉日中正南之方向以為準，次舉立表參直以為法。」其所解說更為明白。<sup>8</sup>

古者表與臬意義相同，本是直立之木標。當日中正午之時，測其射照之景，定正南方向。而《墨經上》所謂「直，參也」，即是測景值之方法。其法對照《周禮·考工記》即能明白：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杜子春云：「槷當為弋，讀為杙。」〕眡〔古視字〕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sup>9</sup>

鄭玄《注》云：「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清儒戴震著《考工記圖》，書中特繪《為規識景》，並附圖說。惟仍不甚簡明。今人方孝博依其制製圖以標示之，先定東西，後定南北，十分正確，如下圖所見：



圖一 《周禮·考工記》測日景定方向圖

(采自方孝博《墨經中的數學和物理學》，頁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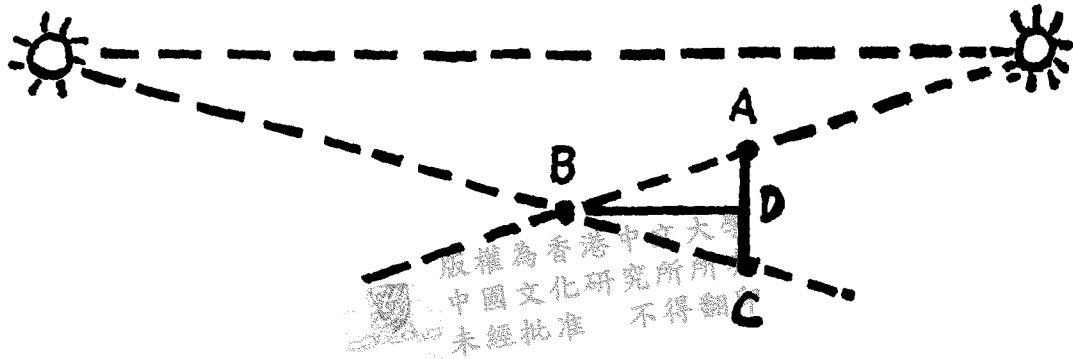
- 7 張其銓《墨經通解》，桂林張氏獨志堂刊本，1931年，卷二，頁二下。
- 8 方孝博《墨經中的數學和物理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頁103。
- 9 《周禮》，阮刻《十三經注疏》本，卷四十一，頁二十三上至二十四上。

《周禮注》解釋十分明白，在此據以解釋前引《考工記》全部文義如下：工程師建造都城，先就地面四角立四柱，用繩子懸鉛錘定柱之正直。四柱定後，再以器盛水，測看四柱高下，測地面是否平正，然後平高就下，終使四角全面齊平等高。再樹立八尺之表(臬)，觀測日景，畫出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再以表柱為中心，用等長之繩規畫日出日入之景跡，其繩弧與日出日入兩景跡相交之點，連成一線，此一直線即是正東正西方向。再以表柱基點與此東西連線之中點連接，畫出一線，即是正南正北方向。此即上古測定東西南北方向之科學方法，簡易而且實用。<sup>10</sup>

中國古代尚有另一種較精密的測算日景以定東西及南北方向之方法，見於《淮南子·天文訓》，其說如下：

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卻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sup>11</sup>

茲附簡圖說明：先樹一表A，再用一表距A表十步遠，但順著日出所照A表之景相合，植定B表位置。當太陽將落入地平時，再用C表距B表十步遠，順著日落時所照B表之景，植定C表位置，然後連結A、C兩表成一直線。再取AC線中點D，與B表連成直線，此直線即是正確東西方向，而通過B表與此BD線垂直之線即是南北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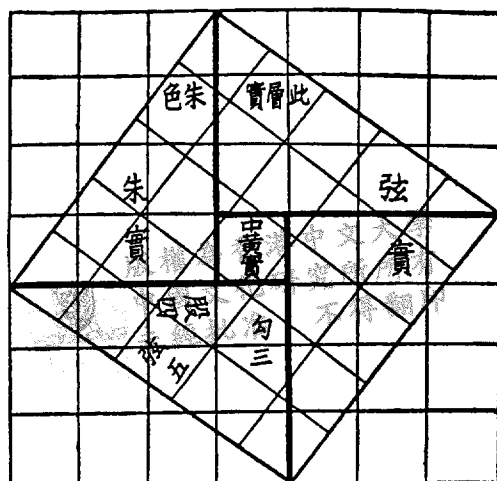
圖二 《淮南子》測日景定方向圖

(采自陳廣忠《淮南子譯注》，頁170)

10 文中所解說《考工記》之方法，又可參考劉金沂、杜升雲、宣煥燦《天文學及其歷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頁27—28。所繪《用圭表定方向圖》，亦甚簡明易曉。

11 《淮南子譯注》，頁169—170。本文引述時標點有所改動。

關於臬(表)之長度，所以定為八尺，亦有其來歷。鄭玄注釋所樹立八尺之臬，指地上植木表長八尺，蓋本於古制。據《周髀算經》，直角三角形有定理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sup>12</sup>是以劃圓成方，折方成矩，折矩而成直角三角形，三角形三邊勾、股、弦之比例是勾三、股四、弦五。《周髀算經》並附圖解析，一目瞭然。茲附開於下，以代解釋：



圖三 勾股圓方圖

(采自《周髀算經》，卷上，頁三上)

古人置臬樹表必以八尺為度，因為相當於股，實取四之倍數，不至失之過短，以免測量不準。

《周禮·考工記》所載文字雖短，而說明古制十分全備。蓋古人辨識東西南北方向，白晝測日景以定正南，昏夜觀北極星以定正北，方法簡易而道理周全，充分表現出中國古人辨別方向之高度智慧。

### 三

中國上古辨識八方九野方位，自當是隨文化起源最早創生之共識，當信在於遠古時代所必有，實人類社會生活中共同需要使然。然其能够見諸文字而流傳後世者，已晚至殷商之世，自是信史憑據。

12 《周髀算經》，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景印《四部備要》本，卷上，頁六下至二上。

惟中國為農業社會，重視四時天象。先以時令為主，就歲時之變換，將日月五星運行，配合方位及遠古先哲之善政，乃逐漸形成五行學說。自春秋戰國以降，內容愈益豐富完備。儒家《禮記·月令》、雜家《呂氏春秋·十二紀》均充滿五行觀念。進一步在紀元前二世紀《淮南子·天文訓》，則作系統介紹，其說極具代表性。茲舉其對「五星」之解釋：

何謂五星？

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

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己。

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

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sup>1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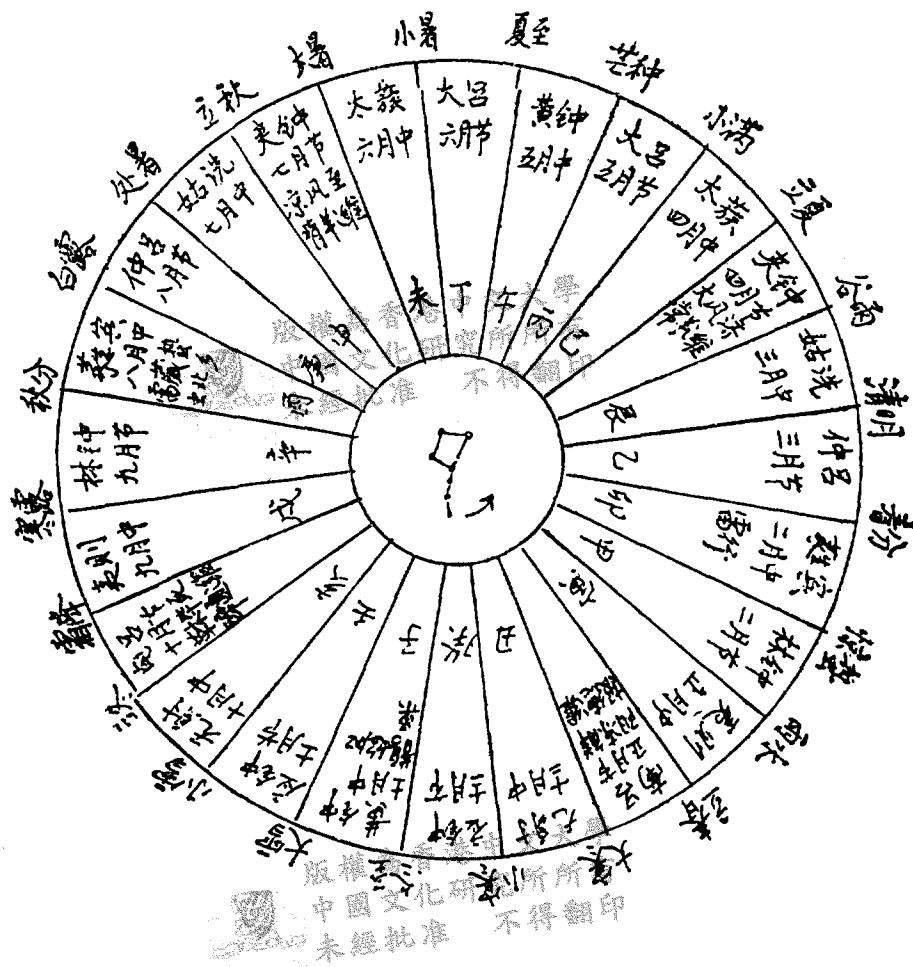
五方配五行及十干，早已出現於《月令》及《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兩處出現，太史公《史記·天官書》亦有所述，可明見其受《淮南子》影響。

本文所特重視之點在於自《呂氏春秋·十二紀》及《月令》以來所習常應用五方方位之符號，係將十干分植五方。不惟如此，在各書同時，即於《逸周書·周月》、《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訓》，以及《史記·天官書》所載，由於農業知識所需要，而詳細解說天象物候之周年四季、十二月、二十四節氣之隨時變化。四季十二個月，分以孟、仲、季代表三個月。二十四氣俱表達於十干、十二支（《史記·律書》稱之為十母、十二子），代表方位之習慣應用。<sup>14</sup>《淮南子·時則訓》尤為清晰詳備。除中央戊、己不計，周天四面方向，俱以單一文字表達，形成辨別符號，計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八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加上東南、西南、西北、東北之四維（《淮南子》定名為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曉通

13 《淮南子譯注》，頁108。又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亦載五星解釋（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卷二十七，頁32-62），與《淮南子》略同而敘列龐雜，益見其所受五行說之影響。

14 凡《逸周書·周月》、《時訓》、《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以及《淮南子·時則訓》，其紀月均用孟春、仲春、季春等等。而至《史記·天官書》，則全用正月、二月、三月、四月等等記載。此非標新立異，實史官固有規則，蓋循《春秋》家必宗之書法。益可見司馬遷著述本於國家政典之舊藏，其價值彌足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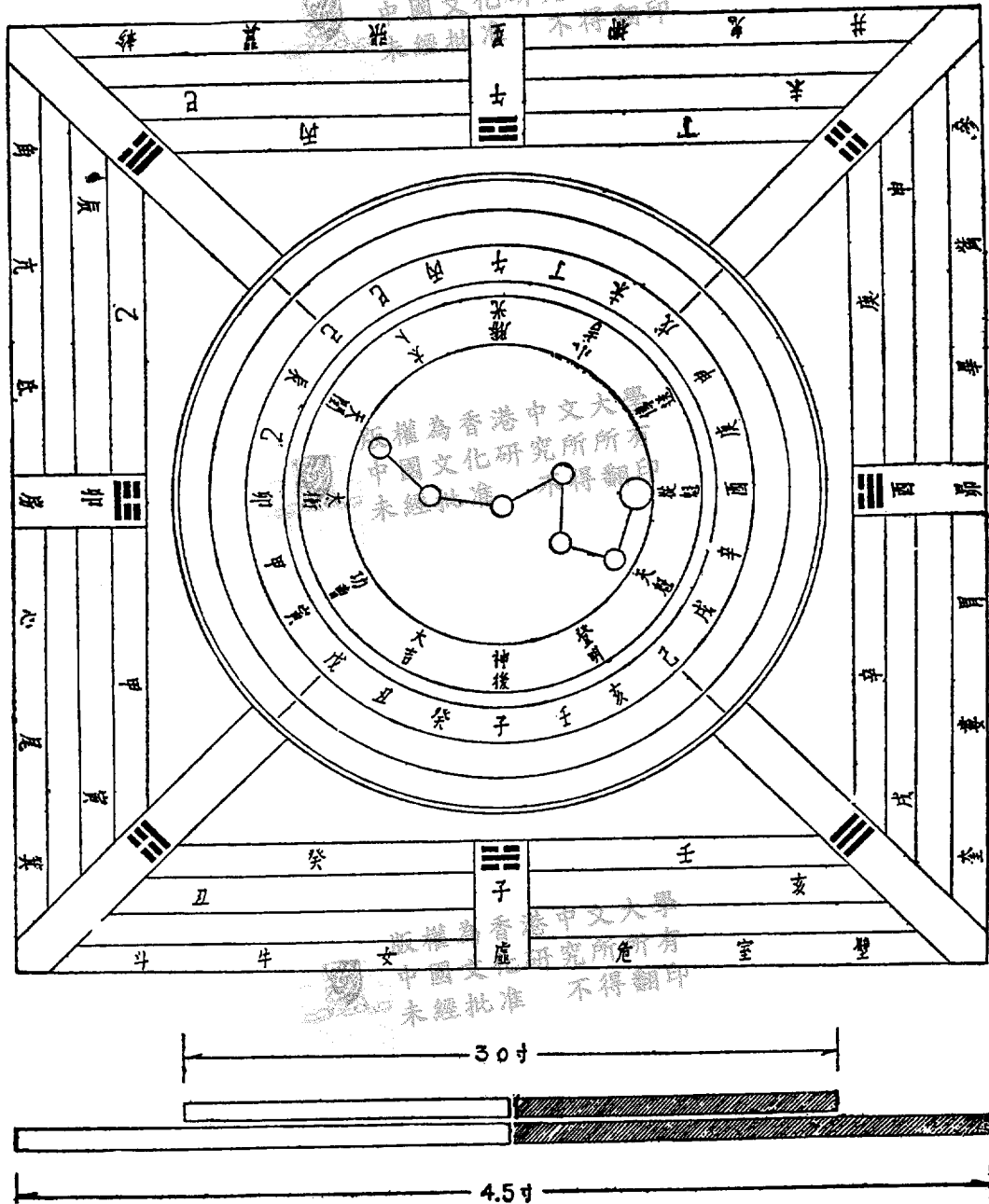
之維)，遂成二十四方位。嗣因四維位當四隅，於八卦則當值乾、坤、艮、巽四方位，而漢代製作占天地盤式，不能不用單一文字，遂又取八卦中乾、坤、艮、巽代替四維位號，<sup>15</sup> 終於形成二十四方位之全部符號定制。茲附圖以備一目瞭然：



圖四 《淮南子·天文訓》斗指方向圖  
(采自陳廣忠《淮南子譯注》，頁125)

15 《淮南子·天文訓》中所稱號通之維。高誘《注》云：「西北純陰，陰氣閉結，陽氣將萌，號始通之，故曰號通之維。」惟影抄北宋本正文及注均作「號」。《道藏》本作「號」，或「號」字之誤。

版權為香港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五 據東漢初樂浪郡五官掾王盱墓葬中占天地盤復原圖

(采自王振鐸《科技考古論叢》，頁108)



以上二圖，首圖係據《淮南子》記載而依實象布圖；次圖則出自漢代天盤實物所載，極具史料價值。其一，標出北斗七星，以表現自《逸周書》以降所謂「斗指」之重要作用。其二，此時之八個天干符號及十二個地支符號，在盤上已各值一定方位。其三，在《淮南子》一書屢次提到的四維，在盤上已由乾、坤、艮、巽四個符號代表應值。<sup>16</sup>

由此可知，二十四方位之確立，雛形創於《逸周書》、《呂氏春秋》之二十四氣，而定形於《淮南子》之明示斗指運用及方位符號之排列。實物證據，則有東漢明帝時王盱墓出土之占天盤。此外又有西漢夏侯竈墓出土之二十八宿圓盤，此盤年代比《淮南子》成書年代為早。蓋淮南王元年是漢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而夏侯竈即高祖開國功臣滕公夏侯嬰之子，已在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去世，其卒年尚在《淮南子》成書之前。占天盤分上下兩個同形圓盤，上盤之中央亦繪有七星，像斗指軸心；而下盤依逆時針方向則有二十八宿名稱。方向次序實與上列次圖相同，自可恃為紀元前二世紀實物證據。<sup>1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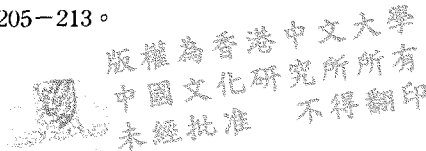


《逸周書》七十一篇，《漢書·藝文志》著錄，至東漢尚無亡佚之說，唐以後已缺十篇。顯然在戰國秦漢之世，《逸周書·月令》自成為共所參考。後世之《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訓》、《天文訓》與《逸周書》長期並存，豈有不加參閱之理？觀《呂氏春秋》、《禮記》兩書所載，文字句次什九雷同，當知其所本同源。故《逸周書》雖亡《月令》一篇，應為兩書所承襲。抑且《逸周書》仍尚保有《時訓》、《周月》兩篇未亡，足可憑而對校對比文意，愈信上古《逸周書·月令》淵源。至於《夏小正》則當為《逸周書·月令》、《時訓》、《周月》之淵源。嗣後紀元前二世紀中葉之《淮南子·天文訓》、《時則訓》、二世紀末葉之《史記·曆書》、《天官書》，仍一脈相承，俱襲前說。可知中華以農立國，最重歲時節令。自孔子得夏時以來，羣儒相傳，未嘗中斷。此是據可靠文獻證據，而實際當為時更早。

歲時節氣，備農業生活活動參考，並未以釐定方位為主。然觀測天上星辰移動，則是用以了解四時變化。對某星位置變換之認識，自然必建基於方位區別之上。特別為人所重視者，即北極星之準則、北斗星之運轉，以及二十八宿之區位。此實由於中國上古「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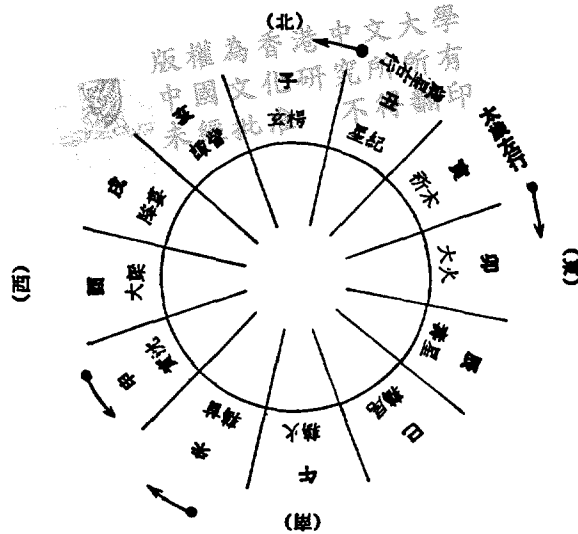
16 參王振鐸《科技考古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頁107-109。

17 參劉金沂《從「圓」到「渾」——漢初二十八宿圓盤的啟示》，載《中國天文學史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第三集，1984年，頁205-213。



說」為商、周、秦、漢數千年最具效力之天文理論，是中國古代天文學說之主流。<sup>18</sup>

中國古代凡推算歲時變化，所依據之基礎及推算方法，均採取永恆性常規運轉之星辰為標準，實最穩定而客觀。就年曆變化而言，如前所引《淮南子》，古人選擇木星，定為歲星。木星需十二年環繞周天一周（實則十一點八六年繞太陽一周），惟人在地上觀察天空星辰，在天動地不動觀念之下，本來地球是右轉運行，卻只見天體各星左轉運行，一概自東向西轉動。惟歲星一年移三十度，也是右行，與世人觀測天體左行方向相反，對於常人十分不便。因是古代天文學家創出一個假想之星，《淮南子》稱之為「太陰」，《史記》稱之為「歲陰」，《漢書》稱之為「太歲」，後世相沿，習稱「太歲」。其運行方向與「歲星」（木星）正好相反，是由右而左行。茲於此附上太歲紀年運行與歲星紀年運行，兩者轉動方向所值十二辰之位置圖，庶幾一目瞭然，清晰易曉：



圖六 歲星及太歲反方向運行周期圖

(采自王力《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下冊第一分冊，1964年，頁802)

18 參陳邦懷《商代金文中所見的星宿》，載《一得集》，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頁54—63。陳文學出商代金文中所見二十八宿中之十二個星名，並學夏鼐的見解云：「由可靠的文獻上所載的天文現象來推算。我國二十八宿成爲體系，可以推到公元前七世紀左右。真正起源可能稍早。但現下沒有可靠的證據。至於文獻學方面考據結果，也和它大致相符，或稍爲晚近。現下只能上溯到戰國中期（公元前四世紀）而已。」陳邦懷氏繼續申說：「近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隨縣戰國初年曾侯乙墓發現了繪有二十八宿圖的漆箱，這就把二十八宿體系的創立年代提前了一步。可以想見，在此之前，還應有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階段。」陳氏此文係1980年5月所寫。又參潘籍《我國早期的二十八宿觀測及其時代考》，《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頁137—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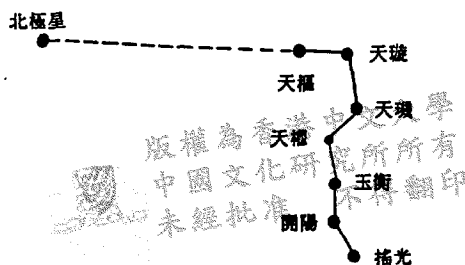
依照上圖所示，太歲自東而西左向運行，十二年而繞周天一周。歷史根據，已在《淮南子·天文訓》具體解說：

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sup>19</sup>

此處《淮南子》中的「太陰」，即「太歲」之異稱。這就是中國古代所創太歲紀年法，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分別值年命名，十二年周而復始。若配合十干，自甲子、乙丑、丙寅……以至辛酉、壬戌、癸亥共六十年，合為六十甲子一個周期，然後重新一再循環計算，此為中國自古以來之紀年法。

再就一年之內立言，實為古聖先賢經驗所創造，卻是中國萬民人人直接應用於日常生活之歲時節令。自古至今，基本制式並無變化，是即民人土庶習用之歲、時、月、日、節氣、物候等系統，真正代表中國民族生活習慣與特色。

中國固有歲時節令制式，古人所定測算方法，仍以天上星辰作指示根據，是即對於北斗七星之掌握利用。其法十分巧妙，然亦普通簡易，充分顯示古人經驗智慧結晶。北斗由七星組成，各有名稱。自斗魁起計：一天樞、二天璿、三天璣、四天權、五玉衡、六開陽、七搖光。古人最早靠北極星夜間定方向，蓋知其恆定不移。故孔子諭告為政之君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篇》）今人方便之法，是根據北斗星之天樞、天璿兩星連成直線，按兩星間直線長度向天樞一方延伸五倍，即是北極星位置。而天樞、天璿又合稱為指極星，茲附圖明之。



圖七 北斗七星及指極星圖

（采自王力《古代漢語》，頁787）

19 《淮南子譯注》，頁110。文中太陰即太歲，為假設之歲星。所謂「太陰在四仲」，「四仲」分別指子、午、卯、酉四方位，也就是正北、正南、正東、正西的位置。此言太歲左行運轉，每一日行十二分之一度。一年之內，運行三十度又十六分之七。十二年之中，周天運行一周，乘十二，積累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

正北方極星定向，早為商、周時代所習知，固極簡單容易。其更重要之應用，則在於定四季春夏秋冬以及周年十二個月。《淮南子》介紹定四時十二月方法，前後不下五次，其一如下：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sup>20</sup>

其二如下：

太微者，主朱雀。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日移一度，(凡)(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sup>21</sup>

上引《淮南子》兩節，一謂「帝張四維，運之以斗」，一謂「紫宮執斗而左旋」，可知帝即紫微北極星，由其使斗向左旋運轉。《史記·天官書》云：「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sup>22</sup> 鄉即方向之向。蓋言用斗運動，逐月指不同方向，十二個月，自寅至丑，歷指十二個方向，一年之間循環一周。雖本意說明十二個月之運轉，內中已隱然表明十二個不同方向。再據《史記·曆書》所記：「正北，冬至加子時；正西，加酉時；正南，加午時；正東，加卯時。」<sup>23</sup> 北斗以不同時令指向子、午、卯、酉四個方位，亦即正北、正南、正東、正西四個方向。古代稱為四仲，即為四季標幟，又為四方定點。從「斗指」觀念早熟用於《逸周書·周月》，明謂「斗指兩辰之間」，當信古人就北斗星斗柄指向，以判斷月日節令，久為上古習用之制，起源必早於周代。至於「帝張四維」之四維，是北斗運轉於周天圓環之中，可以子午連一直線，相交於卯酉連接一直線之上，《淮南子》稱為「子午、卯酉為二繩」（見《天文訓》）。即如圓周形畫一垂直相交兩直線，把圓形天蓋整齊分成四個限象，即是所謂之四維，甚易明白。

一年十二個月，北斗星斗杓運轉而環周天指向十二方向，每一方向用地支一辰代表，則十二方向因十二個月變化而一一表出，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個代表符號。

惟自《逸周書·時訓》以降，《呂氏春秋》、《禮記》，以至《淮南子》，於一年之時限內更

20 《淮南子譯注》，頁137。

21 同上注，頁116。

22 《史記會注考證》，卷二十七，頁8。

23 同上注，卷二十六，頁52。

細分二十四節氣。特別是《淮南子》將斗指一一說出所指應值之符號。茲引《淮南子·天文訓》，以見二十四節氣之定位及二十四方向之所承根柢：

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當為「斗」)日行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原誤「氣」〕蕤賓。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五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太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而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當為「藏」)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sup>24</sup>

24 《淮南子譯注》，頁121—122。利用斗杓指向以定二十四節氣，只是古代一種觀察方法。另外尚有一種著名方法，其淵源實亦甚古老。是觀測日景長短之法，載於《周髀算經》，卷下，頁十二下至十三上。茲附開《周髀》所載圭表所測日景長短以定二十四節氣之結果：

冬至晷長一丈三尺五寸	夏至一尺六寸
小寒丈二尺五寸(小分五)	小暑二尺五寸九分(小分一)
大寒丈一尺五寸一分(小分四)	大暑二尺五寸八分(小分二)
立春丈五寸二分(小分三)	立秋四尺五寸七分(小分三)
雨水九尺五寸二分(小分二)	處暑五尺五寸六分(小分四)
啟蟄八尺五寸四分(小分一)	白露六尺五寸五分(小分五)
春分七尺五寸五分	秋分七尺五寸五分
清明六尺五寸五分(小分五)	寒露八尺五寸四分(小分一)
穀雨五尺五寸六分(小分四)	霜降九尺五寸三分(小分二)
立夏四尺五寸七分(小分三)	立冬丈五寸二分(小分三)
小滿三尺五寸八分(小分二)	小雪丈一尺五寸一分(小分四)
芒種二尺五寸九分(小分一)	大雪丈二尺五寸(小分五)

凡為八節二十四氣

此處所引《淮南子》文，表達北斗斗杓按一年二十四節氣，逐一指向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甲、乙、丙、丁、庚、辛、壬、癸，以及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蹄通之維，共二十四方位，表現相當之節氣，十分清楚。自可證明其因分判歲時節令，而自然連帶定出周天二十四個方向。此是最清晰明白之文獻證據。

關於中國古代斗指定方向之法，應早見於《逸周書》。至於北斗七星如何指法，則以《淮南子·時則訓》所載最為明白。《淮南子》記述周年十二個月變化，首先說到「招搖指寅」、「招搖指卯」、「招搖指辰」，以逐月輪至「招搖指子」，周而復始。後世學者以為斗杓第七星「搖光」即是「招搖」，以為漢代人均作如此認識。惟晚於《淮南子》之《史記》所記並非如此，而是北斗斗杓近處向外延伸尚有二星。《史記·天官書》云：「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sup>25</sup>《史記》與《淮南子》年代相近，想必理解相同。

「招搖」星名，尚不止前述二書記載，近十餘年雲夢睡虎地發現秦簡《日書》，原係秦莊襄王至秦王政年間一位名「喜」的秦人所藏，應至少為公元前三世紀中葉之物。蓋喜死於戰國末年，殉葬品決非殉葬時所寫。據饒宗頤、曾憲通之考證，《日書》中載有「玄戈」、「招搖」二星，並詳記秦曆十月至九月一周年之間「招搖」指向，茲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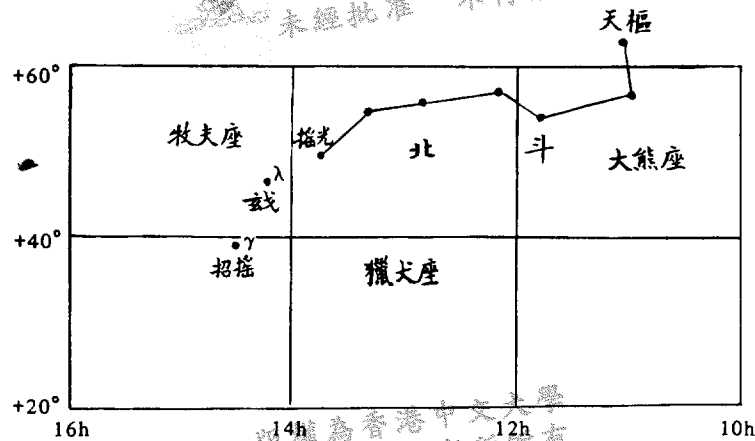
十月	招搖擊未	玄戈擊尾(宿)
十一月	招搖擊午	玄戈擊心
十二月	招搖擊巳	玄戈擊房
正月	招搖擊辰	玄戈擊翼
二月	招搖擊卯	玄戈擊張
三月	招搖擊寅	玄戈擊七星
四月	招搖擊丑	玄戈擊此(觜)
五月	招搖擊子	玄戈擊畢
六月	招搖擊亥	玄戈擊茅(昴)
七月	招搖擊戌	玄戈擊營室
八月	招搖擊酉	玄戈擊危
九月	招搖擊申	玄戈擊虛 <sup>26</sup>

秦簡《日書》之出現，大有助於理解《淮南子》「招搖指寅」以至指丑之十二個月記載，當可確知先秦早有淵源，為天文星曆所熟用，更可知《史記》中之「天鋒」實《日書》之「玄戈」。饒宗

25 《史記會注考證》，卷二十七，頁10。

26 饒宗頤、曾憲通《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頁13-14。

頤特就北斗七星再加「玄戈」、「招搖」，繪出其天文圖上之位置，至為精密可據：



圖八 玄戈、招搖在天文圖上之位置  
(采自饒宗頤、曾憲通《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頁16)

於此足可澄清古代「斗指」之應用方法，係據「招搖」、「玄戈」二星左行環指周天，原在標示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氣。同時亦自然分判周天二十四方位，而秦簡《日書》為最完備之記載。《淮南子》多處出現，更為詳明，應為先秦兩漢最晚之正確記載。

## 五

中國早有八方九野觀念，平日普通指示方向，原無不足之處。而天文曆法上藉星辰觀測以定歲時，終於開創使用天干地支符號，合為二十四方位，甚且隨二十四節氣表現，附帶而創生。然其在戰國秦漢之世，地理方位上未必為人經常使用。甚至地輿專家，應用四至八到已足，無須擴大細分。

惟自中國唐宋時代，海上交通活動擴大至境域外海。茫然行舟於重洋巨浸之中，依中國指南針之發明而應用於航海定向。至少在北宋徽宗時代十一至十二世紀已有指南針慣用於航海行舟之記載，如朱或《萍洲可談》所記：「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或以十丈繩鉤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海中無雨，凡有雨則近山矣。商人言，船舶遇無風時，海水如鑑。」<sup>27</sup>

27 朱或《萍洲可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頁三下至四上。參王爾敏《近代史上的東西南北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期，1986年，上册，頁101-113。

蓋凡指南針一詞及指南針之應用於航海，《萍洲可談》均有切實記載。察其所述詳備成熟情況，當信在唐宋時代航行於交廣外海船隻自當習慣使用指南針，行海舟師為先知前驅，豈須等待書生載筆之後方才使用？北宋以來行海定向使用指南針，其使用方法，據宋人沈括《夢溪筆談》所述，已知是磁針指南，且有磁差。磁針用法有四，以置於水中較為合用。故當時航海實用，乃在於發明水羅盤，實為中國對世界文化之重大貢獻。其創制肯定不晚於北宋，即西元十一世紀。<sup>28</sup>

宋代以來使用水羅盤定向航海，所應用方位區畫，即是沿承西漢完成之二十四方位制度。原在水羅盤四周內側，刻畫二十四等距刻度，每格畫分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及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再加上乾、坤、艮、巽等字合成二十四方位代表符號，方式與漢代完全相同。《夢溪筆談》載沈括承襲前代製地圖經驗，而申述其所著《守令圖》，及其依照之二十四方位定向方法。茲舉其說：

地理之書，古人有《飛鳥圖》，不知何人所為。所謂「飛鳥」者，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為圖，則里步無緣相應，故按圖別量徑直四至，如空中鳥飛直達，更無山川回屈之差。予嘗為《守令圖》，雖以二寸折百里為分率，又立準望牙融，傍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鳥飛之數。圖成，得方隅遠近之實，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後世圖雖亡，得予此書，按二十四至以布郡縣，立可成圖，毫髮無差矣。<sup>29</sup>

沈括之說，表達出二十四方位在地理學上之實質用途，成為中國地理學、地圖學上一個純粹學術基礎。嗣後獨立應用，自北宋以來，一直成為中國輿地羅盤（亦稱羅經）定向之主體，是為自漢代以至唐、宋時代之重大發展。

宋、元、明三代航海定向，始終使用水羅盤，且在宋代已傳入阿拉伯商人之手。明季以還，始逐漸改用旱羅盤。張燮著《東西洋考》，成於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所記針路似仍出於水羅盤。同時代之《指南正法》、《探風相透》二書，則清楚說明航行海船使用水羅盤

28 參沈括《夢溪筆談》（胡道靜校注），香港：中華書局，1979年，頁240。又參王振鐸《司南指南針與羅經盤》，載《科技考古論叢》，頁168—218；及《中國古代磁針的發明和航海羅經的創造》，載同書，頁219—237。按：大澤中行舟，觀北極星定向，《淮南子》亦早有記載。《齊俗訓》云：「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淮南子譯注》，頁496）

29 《夢溪筆談》，頁322。



及取水、下針、二十四方位、丹針、縫針、計程等法。<sup>30</sup>可知中國傳統航海術，自唐宋以迄元明，俱用指南針定向；而當時發明水羅盤，一直沿用至明代後期。至其方位觀念，亦俱沿承漢代以來之二十四方位定向，其各個方位代表字號亦毫無改變，顯見前後一脈相承。

今世流傳明代舟師傳抄之行海針路祕籍，先後問世者已有數種。明刻本《海道經》即附有《海道指南圖》，學者以為承襲元代底本。《鄭和航海圖》明代所用原文太長，乃純作航海使用之參考圖，出於當時所作，久為世重。其次有詳細行海針路指示及地名者則有張燮之《東西洋考》，路線齊全而無圖。而相傳明嘉靖十六年(1537)漳州人吳樸所著之《渡海方經》上下二卷，已經全佚，無從追考。此外明抄本《順風相送》及《指南正法》，亦具東西洋面行海針路記載，今已刊印問世；雖已無圖參考，而彌足珍貴。聞近年大陸尚有發現一些航海針路抄本，盼能早日公之於世。<sup>31</sup>

中國指南針應用於航海，保守估計始於北宋，相當於公元十一世紀，此是據文字記載而言。同時亦可確信是以水盤四周刻二十四方位符號表達方位，此是漢代天文學所定之十二支、八干、四維之天盤運轉及地盤指向知識之延伸。代表符號完全相同，只是水羅盤制是為磁針在水中運轉靈活而使然。在漢代蓋天說思想影響之下，自西漢即有天盤地盤上下配合運轉之創製，如漢文帝時夏侯竈墓陪葬之天地盤相合。且配合天圓地方觀念之下，東漢王盱墓陪葬之天盤為圓形，地盤為方形。惟自秦漢以降，堪輿學日漸發達，地羅經之書層出習見，地盤羅經遂成為羅盤命名淵源。<sup>32</sup>

航海大事在把握航向，指南針之應用自在首要地位。然各地方向路線出於慣行海上之舟師記憶及其記錄，無論如何簡略粗疏，鄙俚無文，均出於航海家辛苦經驗。因是航道圖說、針位記錄，俱成行海要籍。今存文字記載航行路線之書，最早為元代之《海道經》，明代《鄭和航海圖》則可視為中國行海航路典籍之標準形式。在航行用語上稱之為針路，後世各書往往習見。

30 張燮《東西洋考》(謝方點校)卷九《舟師考》云：「長年三老鼓柁揚帆，截流橫波，獨特指南針為導引。」(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70)又向達輯《兩種海道針經》載《指南正法序》云：「自古聖賢教人通行海道，全憑羅經二十四位。」(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107)

31 參章巽《記舊抄本古航海圖》，《中華文史論叢》，第七輯，1978年，頁193-205。

32 參王振鐸《科技考古論叢》，頁168-182。



上圖鍼路路線讀法如次：

### 一、去程

東沙外放洋，單辰針十更取雞籠山頭。  
 自雞籠山頭乙卯針、單卯針十更取釣魚台。  
 自釣魚台單卯針四更取黃尾嶼。  
 自黃尾嶼單卯針十更取赤尾嶼。  
 自赤尾嶼乙卯針六更取姑米山。  
 自姑米山單卯針取馬齒山。用卯及甲寅收入。

### 二、回程

用甲針放洋，辛酉針一更半見姑米山。  
 又辛針四更，辛戌針十二更，乾戌針十四更，單申針五更，辛酉針十六更見南杞山。  
 坤未針三更取台山。  
 丁未針三更取里麻山。  
 單申針三更收入定海，進閩安。

羅經所謂之卯針，指正東向，乙卯針東東偏南向。辛酉針指西西偏北向，酉針正西，辛針西西北，乾戌針西北。申針西西南，坤針西南，丁未西南南偏南。指向區別細密。單針又稱丹針，指二十四方位所居某位正向。若辛酉、乾戌，皆稱縫針，指兩方位符號之間之方向。二十四方位若用縫針，則實為四十八方位。近代歐西航海用十六方位，加倍為三十二方位，實仍不及中國四十八方位詳細。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一書中，最值得注意者是其一個羅盤針圖，可以正式代表中國航海使用早羅盤之圖形記載。比之航海針路記述諸書，多明指為水羅盤；而此圖所示為磁針恆定於中央之早羅盤甚是清楚。<sup>34</sup> 茲舉原書圖樣以備參考：



圖十 鍼盤

(采自徐葆光《中山傳信錄》)

34 王振鐸《科技考古論叢》云：「中國海船應用早針之記錄，以康熙五十八年(1719)徐葆光出使琉球所纂《中山傳信錄》為最早。」(頁200)

此外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周煌出使琉球，亦將旱羅盤圖形繪記於其所著《琉球國志略》之中。當今學者王振鐸推證此類旱羅盤之式，應久為福建海疆航海習慣應用之物，雖在清初列注載籍，實已普遍為水師官船採用，已不視為新奇。<sup>35</sup>

至旱羅盤之創制，當出於歐西航海技術之改良，明末西洋教士東來始傳入中國。另一說法則謂穆宗、隆慶間，因倭寇屢犯閩浙沿海，行舟用旱羅盤，遂廣為船民仿習。<sup>36</sup>

中國直接記述西洋航海所使用旱羅盤者，以王大海所著《海島逸志》為最早而且詳明，為時當在乾隆四十八年至五十六年間(1783—1791)。王氏漳州人，贅於爪哇之三寶壠甲必丹之家，多年居荷蘭殖民地，習見荷蘭海船。《海島逸志》記載其旱羅盤大致云：

指南車不用鍼，荷蘭以鐵一片，兩頭尖如梭，中心一小凹，下立一銳承之，式如雨傘。面書荷蘭字，分十六方向，洋帆所向用之。<sup>37</sup>

至於最具時代代表性且值得學者注意者，則為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祝壽特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來華覲見。其使團中副使司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在覲使期間十分細心考察中國事物，對於中國航海使用之旱羅盤，作一個精細繪圖，著書介紹給西方世界。不但製圖仔細清楚，而且詳加解說，真正表現當時中國羅盤盤面方位指示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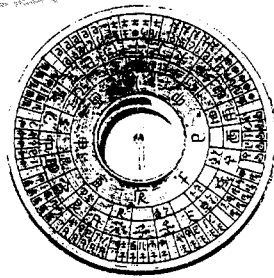
35 參王振鐸《科技考古論叢》，頁200。

36 同上注，頁199—206。

37 王大海《海島逸志》，《舟車所至》節錄本，頁十八下。按王大海原書所載更為詳盡，惟節錄本已具要點，無須再加詳引。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之切實形制。其盤面第三環之二十四方位並延伸外環之七十二方位，可以清楚掌握，最具有歷史性代表意義。<sup>38</sup> 茲附其所繪圖以備參考：



圖十一 司當東繪早羅盤圖

(采自George Leonard Staunton,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mbass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38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in his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mbass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says:

The compass, however, is in universal use among them. Their magnetic needles are seldom made longer than an inch, nor thicker than a line, or the twelfth part of an inch. They are poised so nicely, or ticklishly in the box, as to be moved by the smallest change of position towards the west or east of it; but as the perfection of a compass consists in the magnetic needle's keeping steadily to one fixed portion of the heavens, whatever motion may be given to the containing box, or surrounding object, the Chinese have an ingenious method of accomplishing this; which, however, cannot be considered very interesting to any of our readers.

The Chinese compass box, as will appear by the annexed correct engraving, has, upon its upper surface, several concentric circles, of correspondent sizes. The innermost, and of course the smallest, contains eight different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stand for the four cardinal points, east, west, north, and south; and the four bisecting ones... north-east, south-west, north-west and south-east. These eight characters are also meant to express as many equal divisions of the natural day, each of three hours; and that of the east being placed towards the sun-rising, the rest, of course, will represent, nearly, the position of the sun at the different times of the day. This division of the inmost circle into eight equal parts, accords with the first compass, said to have appeared in Europe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hich, for greater accuracy, was afterwards, and still remains, subdivided into thirty two equal parts or points, each whereof has a distinguishing appellation.

The next circle upon the Chinese compass has twenty four divisions, with appropriate characters denoting a twenty fourth part of the heavens, and, consequently, a twenty fourth part of the natural day; each point containing fifteen degrees, a proportionate part of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the number of degrees into which all celestial circles are divided. (pp. 220-222)

自1793年西人目見而親繪之中國羅盤制式，即知其時定向之精密。其所沿承古老二十四方位，仍居最重要參考地位。可見其圖自內外展之第三環，每一方位又可延展至第四環之三個細部，指示七十二方向，實為準確。

## 七

中國遠古時代先民，既羣居而成部族，共通語言必先發明，日常生活之方向認識，必取資方便易見之標準，以為共遵共喻，遠近共見。自然將日出、日落、日中及背向太陽較為日常相遇之具體情景，引為辨別依據。一般常識性使用東西南北中五方向，已足應用。此殷商以前使用純熟，頻頻見於文字而無可言辯者。至二十四方位之創生，與農業生活起居興作及一年物候之變化有關。按一年四季十二月二十四氣之畫分，是農家興作，活動經驗，累積所見，而在一年循環中判定二十四個氣象物候變化標準。惟欲使人共遵而以為興作活動節奏，其可恃而共見之物，則為北斗星之運行，於是創生「斗指」觀念。人人觀看天上北斗之杓，招搖星之指向，用以認識二十四節氣之來臨。由於依據招搖星之周天運指，自然使周天分出二十四方位，因是二十四方向制度由此形成。有關之文字記載亦當出現在紀元前三世紀，或當更早。

唐宋時代出於航行海外之需要，二十四方位正式以羅盤為定向基準，此乃充分繼承秦漢以來行用習慣；而中國羅盤始終以二十四方位為定向標準，直貫二千載而至十九世紀末。中國航海定向充分承受西人影響、改用西方十六方位制者，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中國輪招商局船隻為洋人駕駛，以及光緒六年(1880)中國海軍北洋艦隊成立，留英學習海軍學生回歸駕駛軍艦，始真正完全改流於西化。然中國沿海舊有船隻，行海定向，仍用固有羅盤傳統定向。直至近今，其間轉變之跡，略可推見。凡我探論文化嬗變之史跡者，宜有所參酌而衡鑑之。

本之於可靠文獻記載，《逸周書》、《呂氏春秋》、《禮記》等書所解，二十四方位觀念形成於公元前三世紀之前，當無疑義。歷代習慣行用，直至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並無改變。其所以改變，並非由於使用上有任何不便，只是中西接觸後，中國為接受西方海軍制度，自必須行用西洋慣用之方位觀念。必須捨己耘人，原無所謂優劣高下問題，實是中國接受現代化不能不依從西方之一定體制習慣。近代中國在航海航空技術上，從中國固有習慣的二十四方位，轉變而為西方航海航空定向的十六方位，前後迅速承接，未嘗發生齟齬與困難、排斥與反駁。此是中國近代文化變遷必經之過程，談不上文化高低，更無須乎自我攻伐。世界文化漸趨於一，定有取捨選擇。近代中國特色，在此文化消長交替上，其經歷最見突出，是以取以為例，加以探討。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歲次壬申清明節

草撰於揮泥揮雨軒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The Origin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wenty-four Directions in China

(A Summary)

Wang Erh-min

The ancient Chinese made use of the sun to distinguish directions. The east, the west,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were the first four directions distinguished. The *ba fang* 八方 (eight directions) and the *jiu ye* 九野 (eight directions plus the centre) and eventually the twenty-four directions followed. This development was recorded in the *Yi Zhou shu* 逸周書 before 300 B.C. and the *Lüshi chunqiu* 呂氏春秋. The concept of the twenty-four directions originated from the division of the year into four seasons and twelve months as well as the motion of the stars. It showed also the influence of the *Gaitian shuo* 蓋天說 (Theory of Canopy-heavens). That is why the characters used to designate the twenty-four directions are the same as those used to designate the twelve months, i.e.,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The rest of them are designated by eight heavenly stems 甲, 乙, 丙, 丁, 庚, 辛, 壬, 癸 and four of the *ba gua* 八卦 (eight diagrams) 乾, 坤, 艮, 巽 which are added in the Western Han 西漢. The twenty-four directions were aimed at dividing the stars which were used to indicate the *ershi si jieqi* 二十四節氣 (twenty-four solar terms). Eventually, an instrument was invented to indicate the twenty-four directions.

In the Tang 唐 and the Song 宋 the Chinese invented the compass for sailing. They used the twenty-four directions as well as the symbols that were handed down from antiquity. From the Ming 明 and the Qing 清 onward, the compass with twenty-four directions (subsequently subdivided into seventy-two directions) came to be used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as marine traffic became more and more busy. It was not until 1880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gan to send students to study at naval academies in Britain and bought British and German naval vessels that the Chinese became more and more Westernized and eventually accepted the Western concept of the sixteen directions.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